

论李纲和岳飞的关系

史冷歌^{1,2}

(1. 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 贵州 铜仁 554300; 2. 河北大学 岳飞文化研究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南宋初年的抗金战争中,被宋人誉为中兴名相之首的李纲与“尽忠报国”的岳飞,都梦寐以求山河一统,但是他们之间却有过误会与不快。李纲经过长期的考察和比较,对岳飞的了解不断加深,终于完全摒弃宋代官场重文抑武之陋习,认为岳飞的忠勇才能非其他文臣武将可比。根据今存的李纲《梁溪全集》中李纲致岳飞的四封书信,以及李纲给其他人的书信中所透露出的与岳飞交往的信息,考察李纲与岳飞的交往,剖析二人的关系,既可以了解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爱国事迹,亦可加深对南宋初政治的认识。

关键词:南宋;李纲;岳飞;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2)04-0085-06

王曾瑜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时,认为“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也有如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1]。了解和研究南宋初爱国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理应宗李岳并称,他们都是在祖国大劫难时脱颖而出的,但宗泽和李纲是文官,岳飞是武将。在宋朝崇文抑武的历史背景下,其文武差别是必须注意的。宗泽比李纲大二十四岁,李纲又比岳飞大二十岁,论年龄,正好是三代人。

在今存史籍中,有关宗泽、李纲二位和岳飞的关系方面的记载严重欠缺。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记述岳飞和宗泽的关系有疏漏和错误,但大致尚可据今存的宗泽史料,弥补和勾勒其基本轮廓。因为岳飞和李纲之间的大量书信和公文交往基本佚失,《鄂王行实编年》除了岳飞建炎初上书外,对李纲并无片言只语交代,本文的论述只能主要依靠今存的李纲《梁溪全集》。估计大致自绍兴二年(1132年)始,李纲与岳飞通信不绝。但在宋廷炮制岳飞冤案后,岳飞和李纲交往的大量书信和公文就基本佚失,今仅留下李纲致岳飞的四封书信,以及李纲给其他人的书信中,透露出的与岳飞交往的信息。如李纲在绍兴六年(1136年)十二月七日写给张浚的《与张相公第十四书》中,

说“得岳帅报,虜、伪相兼侵犯襄、邓、信阳,兵势重厚,意欲窥图上流,所谋不浅”^[2]①。表明当时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的李纲,收到了岳飞的第三次北伐捷报。又如《梁溪全集》卷129《与薛直老宝文书》,为绍兴七年(1137年)致岳家军参谋官薛弼信,其中说:“承谕分屯九江,殊荷留念。近得太尉书,亦道此意,但欲候有警急,乃始遣兵,深恐后时。”其中“近得太尉书”,乃是指岳飞来信,当时岳飞已授太尉,而岳飞此信今已佚亡。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除了上述岳飞建炎初上书外,对李纲并无片言只语交代,本文的论述只能主要依靠今存的李纲《梁溪全集》。

被宋人誉为中兴名相之首^[2]¹⁷⁵⁷的李纲与“尽忠报国”^[3]的岳飞,都梦寐以求山河一统,但是他们之间却有过误会与不快。如建炎元年(1127年)岳飞越职上书,为什么指责李纲等人?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李纲为岳飞的上级,在宋代官场中重文抑武的积习下是如何看待这位下级的?之后,李纲为什么会摒弃宋代官场鄙视武人之陋习,十分器重岳飞,并期望岳飞能成为“中兴功臣之首”呢^[2]¹²³⁸?剖析李纲与岳飞的关系,既可以加深对他们爱国事迹与爱国主义精神的了解,亦可加深对南宋初政治的认识。

收稿日期:2022-02-24

作者简介:史冷歌(1978—),女,河北保定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宋史。

① 本文引用李纲《梁溪全集》的相关内容时,还参考了王茂华、高纪春、王曾瑜先生《李纲全集校注》电脑版内容与考证时间,特此说明和致谢。

一、岳飞越职上书指责李纲

李纲(生于元丰六年,1083年)书香门第出身,科举及第后进入仕途,比出身于普通农家的武将岳飞(崇宁二年生,1103年)大二十岁,若无抗金战争,或许两人不会有交集;正是因为抗金战争,低级军官岳飞才会上书指责尚书右仆射李纲等人的对金政策与措施。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成为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固然信用黄潜善和汪伯彦,然两人“新擢执政,人望未孚”^[4],考虑到危难的形势,故在登基后五天,即命“资政殿大学士、新除领开封府职事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5]。“国家艰危,至此极矣”的情势下^{[2]1609},六月一日,李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赴南京应天府上任。李纲力荐坚定的抗金派宗泽出任开封知府。在对金政策上,李纲主张“先守后战,而不应和”,相继推行了整饬军队、创设河北西路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等系列抗金政策与措施,却遭到苟安的执政黄潜善和汪伯彦多方的掣肘和刁难。时为元帅府中军从七品武翼郎的岳飞,对南宋朝廷消极地怯战和退避行为十分不满。六七月间,岳飞出于爱国热情,向宋高宗恳切上书言事,大略如下:

陛下已登大宝,黎元有归,社稷有主,已足以伐敌人之谋,而勤王御营之师日集,兵势渐盛。彼方谓吾素弱,未必能敌,正宜乘其怠而击之,而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奉车驾日益南。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准备巡幸,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虽使将帅之臣,戮力于外,终亡成功。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军巡幸之诏,乘二圣蒙尘未久,敌穴未固之际,亲率六军,迤迤北渡,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6]。

宋高宗“唯以和好是念”^[7]的屈辱媾和,以及求苟安一隅的政治构想和设计,与李纲坚定地对抗金政策有根本性分歧。朝堂上,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等力主降金苟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正是在岳飞上书时,李纲的处境也日益艰难。岳飞指责“车驾日益南”,“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归结于“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按照他所处的地位与环境,对宋廷投降政策的批评能切中要害难能可贵,但因官位卑微,不可能了解李纲“入朝月余,边

防、军政已略就绪”的详情^{[7]204},也全然不了解庙堂政争内幕之故。

这次上书后,岳飞因“小臣越职,非所宜言,夺官归田里”^{[6]89},而李纲也于八月罢相、贬斥,以至流放。

二、平定曹成时李纲对岳飞的赞赏及略有龃龉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朝在“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传统策略下,建立伪齐政权。因新成立的伪齐政权需要积累军事实力,在与南宋对峙的淮东、淮西和京西三个战场暂时处于休战状态。“内寇不除,何以攘外”^{[6]922},南宋则趁机平定内寇,巩固统治基础。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末,宋廷令驻扎在洪州的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都总管,平定内寇。二月,宋廷又起用李纲,升他为观文殿学士,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命令岳飞、任士安等将领都归他“节制”^{[7]1048.1056}。

李纲显然不可能对新兴的将星岳飞有深切了解。宋廷令岳飞剿灭荆湖路的曹成匪军,是荆湖路最强悍的一支。然而当时岳家军虽然兵力有一万二千人,实际出战只有七千人^{[6]924.1067},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李纲深悉“今日之事,惟兵将、钱粮为急”^{[2]1142},上奏说:“窃虑岳飞所率兵数不多,钱粮匮乏,未必能济。非得韩世忠统率大兵前去措置应援,及将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司划刷到诸路钱粮通融应副,深恐未能早见招捕了当。”^{[2]706}在“荆湖州县,残破略遍”^{[2]713}的情形下,李纲担心岳家军后勤供给问题,更担心岳飞军的作战能力,认为凭岳飞一军之力不能剿灭曹成,必须调动孟庾、韩世忠大军,才能将曹成“招捕了当”。李纲在给左相吕颐浩的信中,强调对兵力大大少于曹成的岳飞军战斗力之担忧:“非得韩少师率兵一行,恐难致其死命。”^{[2]1090.1094.1095}李纲为此专门上奏,请求宋廷遣韩世忠剿灭曹成,在给秦桧等人的信中,也反复表达了这种意见^{[2]705.1117.1118.1119.1131.1139}。

三月十七日,岳飞自洪州出兵,至闰四月,孤军转战荆湖南路、广南西路和广南东路数千里,独力击溃了兵力上占很大优势的曹成匪军,用实际行动解除了李纲的担忧。李纲此前“闻岳飞者,忠勇持军,颇有纪律”^{[2]1092},如今见证了岳飞破曹成的胜利,对他刮目相看。他在给吕颐浩、秦桧等人的书信中都特别称赞岳飞:“孟、韩二帅殊未曾措置荆湖盗贼,独岳飞能破曹成。”^{[2]1096.1124.1140.1142.1143}强调剿灭曹成,韩世忠的大军未起作用,而是岳飞独成其功。在写给右相秦桧

的信中，称赞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异时决为中兴名将”^{[2]1131}。但李纲在肯定岳飞“近来之所少得”之时，也认为岳飞“有以调御服习之，使知礼义名节”^{[2]1132}。李纲认为岳飞需要“调御服习”，其实还是沿袭宋代重文抑武的官场陋习，故有此语。

在给秦桧的这封信中，李纲还对秦桧说岳飞“近以权安抚之故，亦颇有过举。吕宪书中能道其详”^{[2]1132}。李纲所称“吕宪”，是当时的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吕祉，他在致李纲信中说及岳飞“颇有过举”。李纲又在致左相吕颐浩的《与吕相公第七书别幅衡州》信中说：

近蒙朝廷差拔岳飞一军，存留本路，措置盗贼，专听某节制，方幸有可倚仗。忽闻以岳飞奏报，本路群盗已是静尽……本路盗贼马友、李宏虽已捕杀，其徒党依旧散漫作过；曹成、刘忠虽已溃散，其首首依旧拥众自若。……深虑贼情狡狴，复有窥伺湖南、二广之意，所以深欲得飞，且来了此一事。……今乃听其惮行欺罔之辞，不复覈实，前命方行，后命已改，诸将欲自便者，其谁不然？某恐自此号令不行于将帅矣。

岳飞一军，本司累具申奏祈告朝廷，方蒙矜从，今以飞片纸虚辞，即行改命，窃恐朝廷所以待大帅与武将者，轻重不伦，……兼韩京、吴全等，以飞彊夺其人马，有隙，皆不愿从之，抑使，即复为盗^{[2]1101-1102}。

从上引李纲信中，可知李纲对吕颐浩提及了五件事：一是荆湖路“内寇”尚未平定；二是岳飞却奏报荆湖路“群盗已是静尽”；三是宋廷相信岳飞“惮行欺罔之辞，不复覈实”，令岳飞“屯驻九江”；四是岳飞“强夺”韩京、吴全“人马”，二人不愿意隶属岳飞；五是“恐自此号令不行于将帅矣”。下面逐一分析。

李纲怀抱拯救国难和苍生的强烈愿望，希望在荆湖、广南路宣抚使任上有所作为，恳请岳飞军留在本地剿灭“内寇”，以维护本辖区治安，合情合理。关于岳飞奏报荆湖路“群盗已是静尽”一事，除李纲书信中提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5绍兴二年六月戊戌条载：“诏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以韩京、吴锡、吴全之众戍江州。朝廷闻曹成为飞所破，乃命孟庾班师，李纲径如潭州，而飞以所部之江州屯驻”^{[7]1128}。“朝廷闻曹成为飞所破”，无论是岳飞，还是其他人的奏报，只是说曹成被剿灭，并没有说荆湖南路“群盗已是静尽”。李纲除了上奏宋廷，恳请将岳飞军留在本路，还给吕颐浩、秦桧写信，亦拜托他们考虑“存留岳飞一

事”，担心信在路上耽搁，还让儿子给秦桧写“拜呈”，可见对此事的重视^{[2]736、1126}。

宋廷令岳飞“以韩京、吴锡、吴全之众戍江州”，明确规定韩京等隶属于岳飞。李纲在《与秦相公第九书别幅》中说：“韩京人兵随逐岳飞”，“（岳）飞利其甲马，皆择精壮者，分隶将下，而听其自便，此近年诸将习成之态也。京缘此悒悒抱病，以余卒数百人留茶陵，不复在飞部下。吴锡人兵，亦多散去者”^{[2]1129}。李纲认为岳飞“强并”韩京“人马”，是“近年诸将习成之态”，并非岳飞个案。然《鄂国金佗粹编》卷9《遗事》则载：宋高宗“初以韩京、吴锡二军付先臣，皆不习战斗，且多老弱，先臣择其可用者，不满千人，余皆罢归。数月，遂为精卒。上喜，赐报曰：‘可见措置有方，忠诚体国。’”^{[2]835}说明宋高宗对岳飞“强并”韩京“人马”一事是知晓且赞同，才有称赞岳飞“措置有方”之语。当然，站在韩京的角度看，自己的“人马”被岳飞“强并”，肯定心中不舒服。

李纲提到的第五件事，是担心武将尾大不掉，“恐自此号令不行于将帅矣”。在给权邦彦的信中，也说宋廷“如止坐飞奏而改命，恐武夫不复可号令矣”^{[2]1141}。说明即便是李纲，也依然是以宋朝崇文抑武的惯性思维看待岳飞，此时李纲虽然高度评价岳飞的军事能力，但是对岳飞的人品、性格了解不深。

三、李纲有力地支持了岳飞屯驻襄阳

北宋末，面对金军南下侵宋的危机，李纲强调只有“同心协力”抗金，才能“扶持宗社，保全家室”^{[2]1575}，故人称北宋末“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8]。抗击金军战胜敌人，成为摆在不知兵的李纲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宋金战争实践中，李纲和宗泽一样，由不知兵的文官迅速成长为军事战略家，南宋建立后，鉴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李纲的战略关注点便转移到荆襄地区。

秦岭淮河是中国地理上天然的南北分界线与防线，此防线中的襄阳“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8]1266}，历来是军事要地。故李纲故屡次强调襄阳的战略重要性。建炎元年任相时，李纲“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2]1637}。绍兴元年（1131年）九月，吕颐浩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李纲在贺信中谈到当时的抗金形势时，强调“荆湖上流”之重要，认为“为今之计，保有江左，恢复中原，莫若以料理淮南与荆湖上流

为先。”^{[2]1086-1087} 建议吕颐浩考虑且耕且战经理淮南与荆湖地区之策。翌年(1132年)八月,李纲在给北宋末年成为深交的给事中程瑀的通信中,说“今日至要处,乃在襄阳,控引川、陕,襟带江、淮,下临旧都”的战略地位^{[2]1146-1165}。南宋主战派中的有识之士,如御史中丞赵鼎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上奏,建议宋高宗“经营中原”,“当自荆襄始”^[9];右迪功郎刘焯在绍兴二年十月六日上万言书,认为“欲强进取之资”,“惟荆襄为胜”^{[5]755}。

绍兴三年(1133年),金军配合伪齐李成军占据了邓州、随州、唐州、襄阳府等地,控扼长江中游,使南宋中部防线面临严重威胁。绍兴四年(1134年)春,岳飞上奏“乞复襄阳六郡”,“恢复中原,此为基本”。赵鼎等也认为“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6]262,928}。五月至七月,按宰相朱胜非等人的主张,宋廷令岳飞统兵北伐,一举收复襄汉六郡,大败金与伪齐联军,这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家军从此接管了宋金之间的中部战场,成为抗金的中坚力量。

岳飞为了加强襄汉等地的边防与解决部分军粮供应,上奏提议兴办营田之事,以达到“进攻退守,皆兼利”^{[6]930,939}之目的,可知岳飞也是将襄阳作为收复失地的重要根据地。李纲非常赞同宋廷令岳飞屯驻荆襄的部署,他在《论襄阳形胜札子》中,精彩地论述了驻守襄阳的重要性:“既逼僭伪巢穴,贼有忌惮,必不敢窥伺东南。将来王师大举,收京东、西及陕西五路,又不敢出兵应援。则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进取京师,乃扼其喉,拊其背,致其死命之策也。”^{[2]820} 一直担忧“沿江要害去处,并无控扼”^{[2]1237}的李纲,在绍兴五年(1135年)上奏论攻守策时说,“守备之宜,则当料理淮甸、荆襄以为藩篱”,“当以淮南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李纲甚至对三路大军的作战区域与后勤供给都进行了谋划,如驻扎荆襄的大军由荆湖北路负责后勤供给^{[2]794}。得知岳飞在第二次北伐后,“驻军襄、邓”,李纲写信赞同岳飞“其所摹画,想益宏远”,并鼓励岳飞“乘此机会,早建不世之勋,辅成中兴之业”^{[2]1237}。绍兴六年(1136年),在镇江府召开的都督行府军事会议上,右相兼都督张浚命令岳飞“屯襄阳以窥中原”,并对岳飞说:“此事君之素志也,惟君勉之”^{[6]400},表明张浚早就知道岳飞重视襄阳的战略地位。

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数次觐见宋高宗论“恢

复之略”,强调经营荆襄等“上流”的优势:其一,若汝、颍、陈、蔡等地不能守时,他即“退保上流”,迅速攻击南袭的金军,于金军北还之路伏击;其二,若金军从上流进兵,进攻淮南和四川地区,自己即率军“长驱,捣其巢穴。贼困于奔命,势穷力殫”^{[6]944}。即进可攻,退可守,因此岳飞请求在襄阳置“监司、州、县”。宋高宗下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岳)飞得自黜陟”^{[3]11386},赋予他监察与任免襄阳府路官员的权力,更好地经营襄阳。

李纲“且耕且战,经理荆襄”的战略设想,在岳飞军将士的努力下得以实现,李纲则在后勤供给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绍兴五年(1135年)十月,宋高宗任命观文殿大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10],绍兴六年(1136年)三月到任后,为岳家军提供后勤供应,便成为李纲在江南西路施政的重要内容。当年,江南西路“共实合发米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二石五斗三合”,“四十万石岳太尉”^{[2]931},江南西路的粮米29%供应了岳家军。岳家军当时大致“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11],江南西路“每月应副岳飞大军月桩钱九万余贯,自来系以轻贲、金银,相兼见钱起发”,占岳家军“月用钱”的16%。江南西路为岳家军提供的军器物料供应,数量亦非常可观,仅绍兴九年(1139年)即供应“自造军器:铁甲叶六十九万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只,生黄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张,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两,生羊皮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张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筈一十八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只,翎毛五十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长四寸八分,条铁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两一钱二分”^[12]。岳家军的军器“物料”并非单靠江南西路供应,但就此数额而言,已相当可观。李纲自己也说,“契勘岳飞大军移屯襄阳,所有钱粮,并系本路应副,经由蕲、黄等州,自沔、鄂以趋襄汉,实以本路(江南西路)为根本”^{[2]873,986}。上述引文,都说明了李纲对岳飞军屯驻襄阳的有力支持。

四、李纲对岳飞将才的评价

自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猜忌武将成了天水朝历代皇帝提心吊胆的梦魇、讳疾忌医的心病,文臣们也绞尽脑汁,提出各种压制、监控武将的政策、制度与措施。如军区的文臣统兵,自然是皇帝与文臣们的共同设计;而宦官统兵,更是皇帝的乾纲独运,宠臣辈的

迎合。文臣刘挚说：“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13]刘挚所谓的“祖宗之法”，在宋太祖和太宗时尚未发明。另一文臣任伯雨说，武人“位尊权重”，就必然会“侈然自大”，“跋扈骄蹇”，“则方镇之患，自此成矣”^{[13]728}，似乎只有文官任大帅，方可保证“国家承平”。三百余年间，宋朝武运衰颓，武功不振，将才寥落，当然是宁愿牺牲军事效能，也必须压制、猜忌，以至摧残、杀害良将的必然恶果。

李纲具有远见卓识，对这些文臣所称道的“祖宗之法”有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他在《吊国殇文》与《御戎论》^{[2]1369,1514-1515}中痛批宋朝军事传统下的用将之术，宦官统军的积弊，特别赞赏唐太宗“不从中制”^①的用将之道^[14]。经历北宋和南宋之交大劫难的李纲，热衷于寻觅“中兴功臣”人选，对文臣宰相吕颐浩、赵鼎、张浚等，都曾寄予希望，给予赞扬，甚至还长期未看清秦桧的真面目，但天长日久，都感觉失望。身处乱世的李纲，当然十分关注将才，他说，“以制夷狄，以定祸难，未有不在大将者，诘可忽哉”！也感叹“自宣和以来，夷狄之祸，亦云酷矣，可以当大将之任，如种师道者，凋丧略尽”^{[2]1382-1383}。李纲关注的重点先是韩世忠，后有岳飞。

李纲与韩世忠早有交往，绍兴二年（1132年），在赠韩世忠的诗中写序说“某靖康丙午春，以尚书右丞充亲征行营使。时少师韩公实隶麾下，每嘉其有忠勇迈往之气”，兼以赞美和勉励，“旧钦忠勇冠三军，每一相逢更绝伦。铁马金戈睢水上，碧油红旆海山滨。气吞劲敌唐英、卫，力破群凶汉禹、恂。圣主中兴赖良将，好陪休运上麒麟”^{[2]383}。同年，李纲在《再乞差使臣赍旗榜招抚曹成及论招捕盗贼奏状》中，赞誉韩世忠“忠勇有谋，治军严肃，可以倚仗”，“曹成桀黠，拥众数万，非世忠全军声势之壮，未易使之听从”^{[2]712}。当年，岳家军转战奔袭于岭南炎瘴山区，克服复杂地形、水土不服、粮食供应等困难，以少击众，大破号称荆湖一带最强悍的曹成匪军。“孟（庾）、韩（世忠）二帅以重兵来临，久驻庐陵，皆未曾料理。独曹成一项，为岳飞所破”^{[2]1124,1130}。此事已如前述。李纲开始真正器重岳飞。

绍兴六年（1136年），韩世忠举兵攻淮阳军受

挫^{[10]1222-1223}，李纲事后写信评论说：

窃睹邸报，韩侯淮阳之捷，为之喜而不寐。……要之王师之举，莫而后发，当如破竹建瓴，使人心响应，则大勋易集。今群帅未动，初无牵制策应之师，而孤军独住，则其进似太锐；援兵既至，未尝设伏，以谋胜之，反为所困，仅能溃围而出，遽还故垒，则其退似太速；而所得郡县既不果守，必有遭屠戮，而失望者。此某之所以初喜，中疑，而卒以为忧也。深虑韩侯忠勇，忿于小失，率师复进，堕贼计中，则安危存亡所系，岂浅浅哉^{[2]1202-1203}！

可知，此时他对韩世忠军事指挥才能的评价不高，而此信特别反映了李纲军事战略见识之高明，在今存史料中，对淮阳军之战浮词居多，尚无一篇文章，能对此战评说得如此深中肯綮。当年秋，岳家军举行第二次北伐，李纲在十月初给岳飞写信说：“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雒、商、虢间不见汉官威仪久矣，王灵乍及，所以抚循之者无所不至，想见人情之欢悦也。继闻驻军襄、邓，其所摹画，想益宏远。”^{[2]1237}与前一封信的文字对比，可知在李纲心目中，韩、岳两将的军事才能，优劣分明。当月十六日，李纲又写信说：“戎事方兴，朝廷以荆、襄大计仰成少保，愿言益励壮猷，早建大勋，为中兴功臣之首，诚所望于左右也。”^{[2]1238}

李纲虽与岳飞未曾会面，但显然经多方面的打听和了解，苦心寻觅多年方得有此肺腑之言，其言极为殷切，而语重心长。在他眼里，依岳飞的忠勇才能，理应成为“中兴功臣之首”，期盼之高，非其他文官武将可比。在宋朝特殊的崇文抑武官场环境中，李纲能够在思想深处完全抛弃文官辈自持甚高、藐视武人的积习，尤为难能可贵。然而无情的事实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李纲辞世后数月，岳飞大举北伐战绩辉煌，却被宋廷迫令班师，又接踵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遇害。一颗赵宋皇朝最光彩夺目的将星，竟不陨于寇，而死于朝廷。漆侠和王曾瑜先生都尖锐地抨击了赵宋皇朝“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的极端残忍和卑劣行径^[15-16]。

李纲赤心报国，“心劳形瘵，食息不暇”^{[2]1305}，“自春徂秋，俾夜作昼，无少休息，比日出师，尤极忧惧，寝

① 《新唐书》卷93《李靖传》原文作“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李纲显然是针对宋朝用将之弊，有意把“治”字改为“制”字。

食皆废,须发尽白”^[2]⁶¹⁶,却落得贬责的下场;岳飞为求中华一统,献身于“从头收拾旧山河”^[17]之伟业,却被宋高宗特设的诏狱冤杀。李纲和岳飞两位历史人

物,皆满怀爱国激情,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却下场凄惨。二人的遭遇,看似偶然,实则是宋高宗投降主义政治下的一种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

- [1] 王曾瑜. 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浅谈:以宋代为中心[M]//王曾瑜. 丝毫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3.
- [2] 李纲,梁溪全集[M]. 王瑞明,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2004:1203.
- [3]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1708.
- [4]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 王瑞来,校补. 北京:中华书局,1986:891.
- [5]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55.
- [6] 岳珂,鄂国金佗粹编校注[M]. 王曾瑜,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8:921.
- [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胡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3017.
- [8] 黄淮,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79.
- [9] 赵鼎. 忠正德文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8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47.
- [10] 胡寅. 斐然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37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25.
- [11] 庄绰. 鸡肋编[M]//全宋笔记:第 4 编:第 7 册.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85.
- [12] 张守. 毘陵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7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45.
- [13] 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724.
- [14]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816.
- [15] 漆侠. 杨倩描《吴家将》序[M]//漆侠全集:第 9 卷.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308.
- [16] 王曾瑜.《古今吟诵岳飞诗词选》序[M]//王曾瑜. 丝毫编.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242-243.
- [17] 赵宽. 满江红词碑[Z]. 汤阴:汤阴岳飞庙,1458(明天顺二年).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Gang and Yue Fei

SHI Lingge

(1. 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2. Yue Fei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against the Jin Army invas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 Gang, who was regarded as the head of the famous prime minister, and Yue Fei, who was dedicated his life to his motherland, both dreamed of reunification of their country, but there were misunderstandings and displeasure between them. After a long period of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Li Gang gradually got to know Yue Fei better, and finally abandoned the bad habit of emphasizing literature and undervaluing military power in the officialdom, and believed that Yue Fei's loyalty and bravery was not comparable to other civil servants and military generals. Based on the four letters from Li Gang to Yue Fei in Li Gang's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Xi*, as well as information about his interactions with Yue Fei revealed in Li Gang's letters to other people, examining Li Gang's interactions with Yue Fei and analyzing their relationship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ir patriotism and patriotic deeds, but als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s of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 Gang; Yue Fei

[责任编辑 夏强]